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着力建设符合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的市场体系

□ 黄群慧

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系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体系在这个系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着力建设符合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的市场体系。统一开放、公平竞争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对市场体系的基本要求，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从法制层面保障市场体系的统一开放和公平竞争。

（一）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的经济体系，是国民经济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协调统一的复杂系统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必须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建设一个与实现这个目标要求相适应的经济体系，这就是现代化经济体系。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包括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以及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等七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七个方面的内容涉及国民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国际与国内、政府与市场以及产业、区域和企业各个层面，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科技创新与环境保护等各个领域。可以说，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国民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协同统一的复杂经济系统。

从系统论角度分析，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个复杂经济系统，可以从系统的成长动力、要素结构、运行机制、系统环境、发展目标等五个方面刻画。从系统的成长动力看，现代化经济体系以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依靠创新带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驱动产业体系和区域体系的发展；从系统要素结构看，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高端要素集聚和主导的特征，而且其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各个生产要素以及各个产业、区域、城乡子系统呈现结构协调性；从系统的运行机制看，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高效配置资源的成熟的市场化体制机制，体系内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具有活力，政府宏观调控科学有度；从系统环境看，现代化经济体系面临的是全方面开放的、高度不确定性的国际化市场环境，这要求经济体系也必须具有动态开放特征，从而对市场环境具有很好的适应性；从系统发展目标看，现代化经济体系强调高质量发展，保证国民经济实现既具有创新力和竞争力、又具有绿色可持续性和社会包容性的发展。

（二）

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现代化经济体系运行的基础保障，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然要求建设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

现代化与市场化是紧密相关的。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没有高度的市场化水平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没有真正意义的经济现代化和现代化强国。应该说，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有发达完善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各类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统一构成了市场体系。综合来看，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市场体系具有统一健全、对外开放、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等重要特征。所谓统一健全，是指市场在构成上是健全的、在空间上是统一的，不存在行政区域分割和限制自由流动等问题；所谓对外开放，是指市场体系在国与国之间是非封闭的，对国外商品和要素进入和流出都不具有壁垒和障碍；所谓公平竞争，是指市场体系运行中各种经济主体地位是平等的，在机会、程序等方面是公平的；所谓规范有序，是指市场体系竞争活动具有有序性和规范性，存在有效防止各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则。因此，概括而言，符合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的市场体系应该具有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特征。

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对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有利于形成具有市场导向、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创新体系，从而在提高产业体系创新性、协调性方面发挥积极促进作用；作为交换环节的市场体系具有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特征，又有利于作为分配环节的收入分配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还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各个区域之间流动，从而最大程度地促进各个区域发挥比较优势、有效分工，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从而促进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建设；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有利于避免不正当竞争行为，使高污染、高能耗、生产方式不符合环保标准的企业退出市场，有利于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建设；开放的市场体系，推动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是“一带一路”建设所必需的，是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建设的重要内涵。

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着力推进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建设，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

（三）

推进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建设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强化市场法治，尤其要不断完善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的立法和执法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存在不完善、不成熟的地方，市场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实现统一开放和公平竞争。比如，产权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有效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尚未完全形成，等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这要求，在完善产权制度方面，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而在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要加大要素市场建设和市场化改革力度，形成完善的现代要素市场体系和市场化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不断完善要素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实现各种要素在全国范围的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

关于建设现代市场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等一系列重大要求。要积极贯彻落实这些重大要求，一方面，应该从“放”“管”“服”三方面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向深度广度拓展，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市场准入制度，破除不合理的条条框框，提高市场主体登记管理的信息化、便利化、规范化水平；另一方面，应该进一步完善商事法律的立法和执行工作。实际上，在现代化法治国家中，商事制度的调整主要是通过商法的制定和实施来完成的。因此，从建设符合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的市场体系角度看，通过法治工作来保证市场体系的统一开放、公平竞争尤为重要。在众多相关法律中，《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对于排除妨害竞争的不正当行为、建立公平的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和企业的正当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年是《反垄断法》实施10周年。应该说《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的实施，对我国市场体系的建设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从建设符合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的市场体系来看，我们仍需要在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上继续下功夫。

强化建设统一开放、公平竞争市场体系的法治工作，更重要的是法律法规的实施，尤其是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的执法工作。需要强调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出台的几个文件，对于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执法、打破行政垄断、建设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一是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布，明确提出，加强市场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加快建立竞争政策与产业、投资等政策的协调机制，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促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这就确立了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要求产业政策要与竞争政策协调，促进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逐步实现。二是2016年6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要求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规范政府有关行为，防止出台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逐步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2017年10月《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出台，进一步对公平竞争审查的机制、程序、标准和例外情况进行了明确和规定，使得公平竞争审查更具有操作性。可以说，不折不扣地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当前克服行政性垄断的最有效措施之一。今后，一定要从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高度认识这些工作的重要意义，积极建设符合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的市场体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

把握好服务业“三大变革”的着力点

□ 刘 涛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是要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对于服务业发展而言，同样如此，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实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握好“三大变革”的着力点，更多运用改革、开放、创新的方式，促进服务业发展提质增效。

第一，以质量改进、品牌培育、标准引领为着力点，加快形成服务业发展的质量优势。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服务业发展质量逐步向好。根据有关部门的监测，2017年重点服务领域顾客满意度保持在“比较满意”区间且稳中有升。同时，服务业品牌价值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据全球知名品牌评估机构统计，2017年我国内地有多个服务业品牌入围全球最具价值品牌百强榜，主要分布在银行、保险、互联网服务等行业。

但同时也要看到，与实际发展要求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服务业供给质量还有较大改进空间。一方面，部分知识、技术密集的服务行业质量不高，较多依赖进口，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缺乏有力支持；另一方面，消费领域高品质的服务供给不充分，仍存在标准缺失，无法有效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此，一方面，要支持服务业企业瞄准先进标杆实施技术改造、流程再造，弥补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质量短板，并通过增强监管的协调统一、健全多方参与的监督机制，促进服务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要加大特色品牌等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完善品牌保护体系，引导企业强化诚信自律并提高信用管理能力；支持“走出去”企业对标国际先进标准，扩大品牌影响力。此外，还要支持具备能力的行业协会、产业技术联盟牵头制定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标准，实施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引导服务业企业在追求高标准中创造更多优质供给；培育市场化运作的第三方专业机构，拓展标准化全链条服务，提升国内外标准一致性程度，推动我国优势、特色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

第二，以产业分工深化、新兴技术应用、促进开放竞争为着力点，提高服务业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衡量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指标。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逐年提高，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仍然偏低。

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一要支持制造业企业主辅分离，促进生产性服务环节专业化发展，推动服务业细分行业的要素优化配置。二要加强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普及应用，促进要素资源的网络化共享、协同化开发和集约化利用，在培育服务新业态、新模式的同时，倒逼传统行业组织方式、运营模式的智能化变革。三要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培育多元投资主体，引导社会资本更多投向服务业短板领域，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和丰富服务内容。四要提高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建设质量，扩大新兴生产性服务进口，充分发挥技术、知识溢出效应，改善国内要素供给；加大对“走出去”企业的指导和服务，增强其全球布局及资源配置能力，培育一批掌握价值链关键环节的创新型企业。

第三，以营商环境优化、人力资本提升为着力点，加速服务业新旧动能转换。近年来，得益于营商环境的改善及科技创新的支撑，我国服务业新动能加快成长。基于互联网的新兴服务行业和业态蓬勃发展，特别是电子商务、交通出行、金融等领域涌现出一批“独角兽”企业。与此同时，适应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传统服务行业和业态，也积极应用先进技术进行提升改造，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但也要看到，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对进一步壮大服务业新动能还有不少束缚。根据世界银行的评估，我国内地营商环境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居于第78位，远低于韩国、新加坡等邻近的亚洲经济体。从评估指标上看，我国内地营商环境在办理施工许可、纳税服务、开办企业流程、中小投资者保护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为此，一是发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牵引作用，推进“照后减证”，清理修改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推行承诺式准入，破除对创新创业的束缚；依法保护企业家的创新收益和财产权，进一步完善相关劳动法规，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在坚持“包容创新”监管原则的同时，建立健全以服务质量为导向的动态监管机制，把改革红利转化为发展新动能。二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提高知识产权侵权代价和违法成本，制定在线创意、众创众包、研发设计等新领域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完善知识产权中介服务体系。三是切实减轻服务业企业税费负担，在“放水养鱼”的基础上培植税源；创新多样化金融服务，深化产融结合，完善动产融资服务体系，拓宽服务业企业融资渠道。四是加大服务业人力资本投资，推动资源要素向激励人才的方向倾斜，加强数字技能教育和职业培训，鼓励应用型、技能型、复合型人才脱颖而出。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经济书吧

应对不确定性 防范重大风险

□ 魏礼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体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当中。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是中国历史发展光辉灿烂的四十年。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是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四十年。这四十年，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奇迹；这四十年，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主体。

从财政角度看，财政改革坚持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各层次需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解人民群众面临的各类公共风险作为改革的出发点。例如，四十年前，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国当时面临的重大问题是“短缺”，包括物质经济的“短缺”和各方面的“短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通过改革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这种背景下，财政改革成为经济改革的突破口。财政“放权让利”，一方面调动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释放创新空间；另一方面，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多元化市场主体形成。再如，二十年前，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城乡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生产要素、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原财政体制难以适应新的所有制关系和社会变革的要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财政改革大力度推进，改革重点转向财政支出领域，通过财政改革推动社会改革。在这一时期正式提出了加快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目标任务，强调财政要突出公共性、公平性、公益性和法治性。财政改革着力化解面临的各种公共风险，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不同发展阶段的不确定性、公共风险是不一样的，财政要解决的问题、应对的风险也不一样，这些因素推动了财政的改革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现代财政的新使命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新时代面临的公共风险。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攻坚战，要“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健全各方面风险防控机制，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显然，研究风险防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具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财政改革也具有杠杆效应。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性，而财政改革的目的就是应对各种不确定性，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财政改革的杠杆效应和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改革作为总体改革的组成部分，预防和化解经济社会运行过程中内生的公共风险；二是财政改革可以化解总体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公共风险，为总体改革承担成本，并巩固改革的成果。对于人民群众来说，不同层次的需求并不是先后的关系，而是同时存在的，但在不同的情况下，重要性和需求的具体内容可能存在差别。因此，在不同的阶段会形成不同的需求，产生不同的风险组合，这些需求和风险推动着财政改革。各个维度的财政改革交叉融合，推动着我国财政改革波浪式前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与此同时，理论界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寻求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财政理论体系。作为财政科研工作者，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刘尚希研究员紧密结合中国财政改革发展实践，坚持进行理论思考，笔耕不辍，形成了大量理论研究成果，特别是提出并不断完善以“公共风险论”为核心的财政基础理论。这些研究成果对揭示财政的运行逻辑，阐述财政本质和解释为什么“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都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性和实践说服力，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摘自《公共风险论》序言，本文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本版编辑　欧阳优